

# 晚清英国对华传播地位的生成

□丁松虎

**摘要:**晚清时期,英国在中英信息传播互动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而中国处于弱势地位。学界对该期间的中英传播失衡问题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本文梳理了这种强势地位的生成过程,分析了相关原因。

**关键词:**晚清时期 英国 对华传播 强势地位

晚清时期,英国在中英信息传播互动关系中居于强势地位,而中国处于弱势地位。学界对该期间的中英传播失衡问题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英国对华传播的影响是至为广泛的。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无不接受了在华英报所宣传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洗礼,无不运用从外报上所获得的这些新知识进行思考,以推进自己的救国事业。

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就已开始实行严厉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奉行“庶人不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同时,由于工商业尚未发达,国人投资报业者少,在报上做广告者亦少,国人自办报刊难以盈利,有的出版不久便因资本告罄而无法维持下去。另外,社会上一般人往往将其等同于小说、闲书而轻薄之,父老且有以阅报为子弟戒,视为玩物丧志之一端。<sup>①</sup>

与晚清的传播弱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的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发展迅速。由工业革命带来的传播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报纸印刷的速度,使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进入大众化发展的新时期。报刊税(即所谓的知识税)的废止,推动了英国资产阶级新闻业的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政治的发展使政党政治和商业媒体之间的关系较以往更为紧密,并且相互渗透,以英国的殖民利益为指向的国际传播随之发展。<sup>②</sup>到19世纪末期,英国已成为全球传播中心,并在中英之间的传播关系中明显占据强势地位。在晚清时期,英国的对华传播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英国的对华传播与宗教传播紧密交织。宗教组织是一类特殊的社会组织,有着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宗旨、目标,其布道、传教(传播)活动也有着特殊的规律与要求。在特定情况下,宗教组织亦是不可忽视的国际传播主体。鸦片战争

前,英国就在思考如何打破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抢占中国广大的市场。武力征服当然是经常考虑的一个必要手段,但那是需要条件和时机并非随时可付诸行动的;而思想征服则具有久远的意义,而且易于进行。当时情况下的良策就是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开展活动。对中国传教有着浓厚兴趣的英国海外传教组织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5年。进入19世纪后即具体讨论了派遣传教士来华问题。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吉德(Samuel Kidd)到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以及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在华办报刊、办学校、建教堂。其来华之使命,是推广基督教,实现中国基督教化。但有些报刊主要刊载新闻,并以此相标榜。在传教士所办报刊的新闻栏里,来自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消息最多,从议会召开到文化教育、工商业进展,都比较及时地报道给读者;同时,介绍英国等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夸耀“西政”的进步与优越,企图将中国导入更合乎英国利益的轨道。

第二,英国的对华传播重视与传播对象国的社会文化习俗“对接”,以达到自己的传播目的。19世纪英国传教士赴华传教办报时,一进入中华大地就感觉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强大存在。虽然在华英报所宣传的资本主义文化思想是比封建文化思想要进步得多的意识形态,但这种宣传毕竟属于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传播。于是其“附会儒学”,连语言文字表达等细节也要考虑中国人的接受心理和接受习惯。笔者认为,程曼丽教授在其所著《国际传播学教程》中阐述的“二次编码”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这种现象。“二次编码就是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接。”<sup>③</sup>如果说语言转

换更多的还只是一种技术性的手段和浅层次的转换,那么文化对接就是一种深层次的转换,这涉及传播的针对性问题。一般来说,针对性越强,国际传播的效果就越能接近预期。

第三,英国的对华传播受众定位不断调整,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在华英报的重点受众定位,经历了一个由中国社会中下层向上层人士逐渐转化的过程。在鸦片战争前,英人所办中文报刊的宣传,都面向中下层人士,对上层官绅顾虑颇多,较少接触。编者正是根据读者中“富贵之人不多,而得闲少”<sup>④</sup>的特点,要求稿子要写得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和清政府对外妥协政策开始有了清楚的认识,这就为英报转向争取中国上层受众准备了条件。1861年慈禧太后掌权后,《北华捷报》曾表示:“在这个特别关头,我们要比我们同中国发生联系的其他任何时期,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sup>⑤</sup>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传教士们认识到传教须“走上层路线”才容易奏效。英国传教士们企图通过变换的受众定位,采取有针对性的传播措施,对当时中国的上层社会来一个突破,以达到他们的国际传播效果——使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向西方认同,将中国纳入英国利益乃至西方利益的指向之下。

第四,英国资产阶级报刊的涉华报道内容失衡,经常违背“客观”、“真实”的原则。对此,革命导师马克思曾予以揭露。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指出:“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在鸦片战争中“不断地诬蔑中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非难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可是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

# 抗战时期河南报纸宣传战线的斗争

□李凯灿

河南地处中原,经济、文化、交通及战略位置都很重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三方政治力量因各自代表的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不同,为夺取中原宣传思想阵地,在新闻宣传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形成有别于军事战线的又一条战线——新闻宣传战线。因当时条件的限制,宣传思想战线的斗争主要体现在报纸出版发行领域的斗争。

## 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及其作用

抗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在进行军事抗击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新闻宣传的作用。除中央以外,各省、市、县以及驻军都设有专门的宣传机构。这些宣传机构除了日常宣传工作外,都把报纸作为表达立场、宣扬主张、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重要工具。抗战期间,河南省先后出现了40多家国民党报纸。其中,有国民党中央直接创办的军方报纸,如《阵中日报》;有河南地方党部和教育部门创办的地域性报纸,如《农民导报》和《新南召报》;还有一部分

民办或民主党派创办,受国民党控制的个体性报纸,也有一部分名义上是国民党掌握而实质上为共产党控制的报纸。

国民党控制的这些报纸在民族矛盾上升、统一战线建立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是以宣传抗日为主题的,在宣传抗日救亡,振奋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国内新闻主要报道各战场的军事情况、国民党大员有关抗战的演讲、南京国民政府在新形势下的措施等。在省市新闻方面着重报道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广大民众支持抗战的活动,宣传人民的抗战热情。国际新闻方面主要反映国际时局的动向、盟国对法西斯阵营的进攻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由战争开始时与共产党联合抗战,转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其报纸随声附和。在国内新闻方面,报纸对政府和蒋介石歌功颂德,鼓吹片面抗战路线,反对人民战争,其进步内容减少,反动内容增加。一是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情况作不切实际的报道,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八路军、新四军的辉煌战绩则只字不提,并且在历次反共高潮中充当国民党舆论的急先锋。二是其报纸在军事新闻报道上严重失真,把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大溃败,说成是“因战略关系,转进某地”。三是国民党报纸受个人或集团所控制。《阵中日报》属于蒋鼎文,《华中日报》属于汤恩伯,他们各自为自己的部队宣传鼓吹,而对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战况则不予理睬,造成报界互相矛盾和报纸内容呆板单一、覆盖面狭小的状况。四是国民党当局对报纸控制严密,限制报纸宣传界的言论自由。例如:1943年的《华中日报》发表“救济河南灾民”和“欢呼苏军斯大林格勒大捷”的社论,受到汤恩伯集团军总部的警告。后来又以《华中日报》中有共产党嫌疑为借口,逮捕了该报社的工作人员。

由于上述因素,国民党报纸尽管出版量大,家数多,却不能起到唤起民众的作用。在国民党报纸的一片吹嘘声中,其军队正在丧失士气,一溃千里,有一部分甚

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sup>⑥</sup>又如,在英国政府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大多数在华英报都对“亚罗号”船事件进行了歪曲性报道。

第五,英国的对华传播重视引导舆论、影响舆论和制造舆论,为英国的侵华活动造势和辩护。在19世纪中后期,许多英国传媒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它们诬蔑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19世纪末叶,英帝国主义者炮制所谓的“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鼓吹中国人一旦觉醒,并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

晚清时期英国对华传播强势地位的生成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特殊的国家利益格局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英国资本—帝国主义对其殖民利益的疯狂维护与扩张是中英传播失衡的根源。英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中国已陷入半

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弱国无外交”,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也只能是处于被动地位、弱势地位。其次,晚清时期中英两国所处的国际传播发展阶段不平衡、不对等。现代国际传播诞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欧美国家,<sup>⑦</sup>同时,英国很注重国际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传播系统的建设,积极参与国际传播规则的制定。到19世纪末期,英国的电缆数量占到世界总量的66.3%,它在全球电缆线路上的霸权是显而易见的。<sup>⑧</sup>而在中国,晚清封建统治者实行严格的出版管制和言论限禁,导致19世纪末中国的对外传播仍停留在思想酝酿阶段,<sup>⑨</sup>在世界新闻传播格局中并无一席之地。

总之,中英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新闻传播体制、媒介控制措施、国际传播政策、媒介组织化程度、技术应用水平等综合性因素,导致了晚清时期英国对华传播强势地位的生成与强化。[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课题(项目编号:NWNU-QN-08-3)]

## 注释:

①陈玉申:《晚清报业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②詹姆斯·卡瑞、珍·辛顿著,栾轶玫译:《英国新闻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③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④《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刊于1815年8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⑤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6-178页。

⑦罗伯特·福特纳[美]著,刘利群译:《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⑧周鸿铎:《区域传播学导论》,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⑨甘险峰:《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新闻系)

编校:杨彩霞